

从唐世到宋观

——历史叙事中的“盛唐”概念研究

刘 晶, 蔡金雷

文华学院 湖北武汉

【摘要】唐代与其他时代相比通常被划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的框架下,“盛唐”的概念显得尤为模糊且特殊。其称谓是描述盛世的情绪化表达,因而历来不能真正界定其断限。今人所熟知的“盛唐”概念及断限本质上是宋人界定的诗学范畴,以历史分期的范式隐蔽了其文学审美内核,成为一种文化规训工具而由诗入史对后世唐史认识产生深远影响。“盛唐”概念始终存在着政治属性与文学属性相关性之争议,已成为唐诗学与唐史学研究中无法回避的元命题。本文系统地追溯了“盛唐”一词从唐代到宋代的形成过程,分析宋人“盛唐”观的形成逻辑,解释“盛唐”与“盛唐诗”的联系,力图重返唐人原始语境,回归唐人自身的历史文化视角。

【关键词】盛唐; 安史之乱; 历史叙事; 《唐鉴》之风; 严羽

【基金项目】文华学院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J0900741525)

【收稿日期】2025 年 4 月 15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5 月 7 日

【DOI】10.12208/j.ssr.20250174

From the Tang World to the Song Perspective

——A study of the "High Tang" concept in historical narrative

Jing Liu, Jinlei Cai

Wenhua College, Wuhan, Hubei

【Abstract】 Compared with other historical periods, the Tang Dynasty is conventionally divided into four phases—Early, High, Middle, and Late Tang. Within this Four-Tang framework, the concept of the "High Tang" stands out as particularly ambiguous and special. Its often framed as an emotive label for a "golden age," has historically defied precise temporal boundaries. The modern understanding of the "High Tang"—including its time scope—is a poetic construct defined by Song scholars. By employing the paradigm of historical periodization, its literary aesthetic core is concealed, transforming it into a tool of cultural discipline that, through the mediation of poetry, has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later understandings of Tang history. The "High Tang" has always been controversial abou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litical attributes and literary attributes, has rendered it an inescapable meta-question in both Tang poetic studies and Tang historiography.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the term "High Tang" from its usage in the Tang to its canonization in the Song, analyzing the formative logic of Song scholars' "High Tang" discourse. Ultimately, the paper seeks to transcend later-period frameworks by returning to Tang primary texts, aiming to reconstruc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rooted in Tang literati's own worldview.

【Keywords】 High Tang; An Lushan Rebellion; Historical narrative; Tang Jian tradition; Yan Yu

名词术语随历史的流衍其指示性随之变得模糊。
词语被用于不同的情境,在原有的基础上引申出各种

不同的词义,以至于我们对同一语汇的注解,就因具体
指涉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解释。唐代通常被划分为初、盛、

第一作者简介:刘晶,湖北武汉人,文华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与文化理论、新媒体写作研究;

第二作者简介:蔡金雷,湖北武汉人,文华学院 2021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中、晚四个阶段,“盛唐”这样一种情绪化表达深刻的影响了中国人对待唐王朝的心态。无论是从“初唐”走向“盛唐”的兴奋情绪,还是从“盛唐”走向“中晚唐”的失落沮丧,很容易想到文学中的情节四要素: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可以发现“四唐”类似一种文学化的描述。事实上,今人所熟知的“盛唐”概念源自唐诗学领域。尤其是当“盛唐”指向开元天宝时期时,作为唐诗分期的核心概念,“盛唐”不仅深刻影响了后世诗学讨论,也对唐史的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那么,“盛唐”这一称谓是否具备理论上的正当性?其本质究竟是一个政治范畴,还是纯粹的文学概念?此外,文学的高峰是否必然对应着政治的盛世?因此,对“盛唐”概念本质的辨析,已成为唐诗与唐史分期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重要命题。

唐朝初年,作为王朝自指的“盛唐”尚未明确形成体系表述,贞观年间的国家实力大幅上升,“盛唐”作为歌功颂德之语开始出现(如表 1-1 所示)。武周革命(690 年)造成李唐法统断裂,十余年后,朝臣借武则天病重发动神龙政变(705 年)扶持唐中宗作为李唐正统继承并恢复唐王朝。中宗面对的政局波诡云谲,首先神龙功臣集团日益壮大,中宗于是以武周太子身份承袭武周政治遗产与之对抗,同时亦需平衡武家外戚政治势力的权力,而韦后、相王(唐睿宗)、太平公主等势力的暗中博弈又使中枢权力更加震荡。中宗暴卒接连引发数次政变(唐隆、景云、先天),在此背景下,“尧舜”逐渐成为景云至先天年间(710-713)宫廷政治精英通过援引历史或为建构理想政治空间或为派系

集团争权夺利的修辞策略。如刘幽求跪谏睿宗时强调“国家多难,皇帝仁孝,追踪尧、舜,诚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爱尤厚矣”^[1]。唐人常常以“尧舜”作为典范,从显庆二年(657)起,先代帝王祭祀被纳入唐朝廷的祀典中,祭祀对象是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与汉高祖共 7 人。成书于 732 年的《开元礼》祀谱在为帝尧增置稷为配享,足见唐廷之重视^[2]。中宗朝的韦虚心曾言:“国家德迈尧封,道兼虞观”,德宗朝名相陆贽说:“帝王之盛,莫盛唐虞”(如表 1-1 所示)。开元年间,唐王朝进入新一轮上升期。唐玄宗执政前期,励精图治,重用姚崇宋璟,革新政治。“盛唐”符号与唐王朝开始同构化进程,开元名臣萧茂挺宣称“于赫盛唐,正百王之阙”,李华颂“烈烈盛唐,祖武宗文,五帝赧德”(如表 1-1 所示),皆将王朝功业置于历史比较的坐标系中。值得注意的是,开元二十七年(739)霍山县更名“盛唐县”,《十七史商榷》记载:“《地理志》无盛唐县,唐开元中改霍山县为盛唐”,此举应是附益汉典,《汉书·武帝纪》载武帝曾“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3],事实上,早在开元十二年,玄宗就通过封禅宣告承汉继周。此时玄宗又通过地理命名实现历史符号的空间固化,标志着概念从文本修辞向制度符号的转化。

王炳文认为“盛唐”在玄宗朝以后成为唐朝自指或特指玄宗朝的官方化表述^①,但其性质或许与贞观年间的歌功颂德大同小异。通过检索《全唐文》《全唐诗》中“盛”“唐”二字联用的情况,共有 16 处文字(如表 1-1 所示)。表 1-1 由笔者整理:

表 1-1 《全唐文》《全唐诗》所见“盛唐”^[4-6]

	内容	全唐文/诗	篇名	作者
高祖	自谓德盛唐尧,功高夏禹。	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五	陈三事疏	孙伏伽
太宗	去去相随去,披裘骄盛唐。	全唐诗:卷三十七	赠李征君大寿	王绩
	国家德迈尧封,道兼虞观,盛唐入咏,竭南服以登瀛,训夏从游,穷西荒以铭彝。	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九	北岳府君碑	韦虚心
中宗	一旦羊头入兴,狗尾生谣,将恐巍巍盛唐,取议于后。	全唐文:卷二百七十二	谏中宗置公主府官疏	辛替否
	红楼疑见白毫光,寺逼宸居福盛唐。	全唐诗:卷九十六	红楼院应制	沈佺期
玄宗	烈烈盛唐,祖武宗文,五帝赧德。	全唐文:卷三百一十四	含元殿敷	李华
	于赫盛唐,正百王之阙,思文陛下,光五圣之嗣。	全唐文:卷三百二十二	为陈正卿进续尚书表	萧茂挺
代宗	业盛唐尧际,功成文子军。	全唐诗续拾:卷十六	故功德使凉国公李将军挽歌词	赵迁
	帝王之盛,莫盛唐虞。	全唐文:卷四百七十五	论朝官阙员及刺史等改传伦序状	陆贽
德宗	予享虞舜於九疑,吊罢民乎盛唐。	全唐文:卷五百九十八	珍祥论	欧阳詹
	跻盛唐于雍熙者。	全唐文:卷六百三十一	祭陆给事文	吕温
文宗	呜呼,其盛唐之遗直欤。	全唐文:卷六百五	唐故相国李公集序	刘禹锡
宣宗	承汤沐之封,式示邦家之庆,可封盛唐公主,备礼册命。	全唐文:卷七百八十八	封盛唐公主制	蒋伸
僖宗	盛唐圣主解青萍,欲振新封济顺名。	全唐诗:卷五百五十七	谒梓潼张恶子庙	王铎
不详	粤若盛唐,勃承天光,礼乐克备,典谟允臧。	全唐文:卷九百五十一	祀后土赋	佚名
	肃肃清庙,巍巍盛唐。	全唐诗:卷一十三	郊庙歌辞	

①王炳文:《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1页。

可以窥见其三重表达:其一,建构王朝正统性,唐人常以上古与汉代帝王为比附对象,“盛”“唐”用以歌颂尧舜,推崇汉武帝文治武功的同时,也是为了强化李唐政权的历史合法性;其二,服务于现实政治诉求,谏臣借“盛唐”委婉谏言,讽喻时弊,以此寄托政治理想;其三,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既见于礼制颂赞,亦融入封号系统。如上这些用例虽因样本较少或不能覆盖唐代全貌,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该词在官方文本中的多重意义。

安史之乱(755-763)作为传统认知中唐代由盛转衰的关键事件,安史政权一直以来被定性为乱贼,事实上“安史之乱”也并非是一场“叛乱”的本来面目,处于期间之人并不能完整认知时局全貌,时人未有宋以后不仕二主的价值取向,而是在隋唐鼎革、武周革命的旧有经验上认为唐、燕也是如此代际关系^[8]。其后,哥舒翰兵败玄宗出逃成都,马嵬驿兵变后,肃宗于灵武称帝,唐廷出现了两个中央,中央权威进一步下降。历时八年的战乱并未瞬间摧毁整个帝国的时空秩序,唐代疆域内各个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并非均质的,受到地理距离的阻滞、信息传播的滞后以及权力结构的历史惯性等因素影响,故而形成了不同地区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断裂与缓冲。这种差异化的时空体验,使得盛世记忆在唐帝国疆域内的崩解程度并不均匀。天宝年间,唐帝国大致被分割成三个空间,河北河南“叛军占领区”与帝国中央所在的关中“长安”、战乱未波及的帝国南部。叛乱初期,河北河南作为叛乱集团的根据地,原有的社会秩序崩解,行政体系被叛军权力覆盖,成为“法外之地”,这一空间成为唐朝官方话语中暴力与混乱的象征,与唐廷的“正统空间”彻底割裂。关中地区因地理屏障和信息传递的滞后,短期内仍维持着“夜夜笙歌”的盛世假象,长安作为帝国核心,其宫廷、市井继续运作仿佛仍是盛世,短暂的维系着其“乌托邦空间”。而远离战火的江南,因未被战乱直接波及,成为物资与人口流动的避难所,这些地区在帝国体系中本属相对边缘,却因中央控制力的削弱而获得自治,形成经济与文化上的替代空间,甚至成为玄、肃两位皇帝的角力场。因此平定安史之乱后,对唐帝国而言便呈现出多中心的空间格局,每个空间(叛军、长安、边缘)皆遵循不同的规则与权力逻辑。这种空间的异质,是中央权力的失效与社会结构的碎片化的集中体现。

收复长安后,唐廷努力收复失地以重建中央权威,自幼成长于开元天宝年间的代宗、德宗两位皇帝刻意维持唐朝空间的“正常化”幻象,希望借这个虚幻又存

在的盛世记忆隔离现实困境,掩盖盛世崩塌的真相,然而战争导致的时间断裂比空间分裂更为深刻。战争中心民众的记忆充满血腥与离散,长安精英痛感盛世的幻灭,而边缘民众则是更多通过间接消息传递进行乱世想象。战报、流民口述和文人诗作在不同时空的传播中逐渐拼凑出乱世全貌,成为中唐人的集体记忆,多元的时间体验最终被整合为“安史之乱”的宏大历史叙事。差异化的时空体验被抽象为民族集体的“盛世—乱世”记忆,成为唐人“中兴”理论的核心镜像。相较于景云至先天年间的一系列政治动荡最终导向开元之治,中晚唐四镇之乱泾原兵变、永贞革新、甘露之变等政治变局频频打破唐朝精英的为国家中兴而努力的政治幻梦,或许正因如此,不甚久远的开元盛世图景才令唐人感到印象深刻,这种感性认知叠加文人的文学创造,例如杜甫就曾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逐渐形成了后人对于“盛唐—中唐—晚唐”发展轨迹的历史想象。

唐代人对“盛唐”的认知多以“尧舜”作为理想政治的象征,强调道德治理和仁政。然而,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导致对“盛唐”概念的再认识得以发生。这种变化为后来的宋代提供了重新解读和利用“盛唐”叙事的契机。

安史之乱以来,至宪宗元和年间河北逐渐产生了对唐廷统治的离心倾向,这种离心力最终在河朔藩镇集团结构下与“胡/汉”认同危机交织发酵,形成了河北叛镇于唐廷的共存局面^[9]。长安宫廷与河朔藩镇集团的复杂关系结束于唐末黄巢起义,血腥的战乱席卷全国,将唐廷贵族世系连根拔起,宣告了中古贵族政治的崩解,中央权力落入地方藩镇军阀手中,代之而起的是五代至宋初以军事暴力集团为核心的地方武力型政权迭代过程中。在此过程中,契丹/辽崛起引发的北境压力,迫使中原政权加速内部整合。原有的中原晚唐“胡/汉”族群叙事,在燕云十六州争夺中升格为“夷夏大防”的话语^[10]。值得注意的是,辽人(契丹)亦会以唐事为鉴。天显十三年(938),耶律德光册封石敬瑭为皇帝,同年八月后晋遣冯道、刘昫等人代表晋廷为其上尊号,行汉册礼,时称“盛唐輶辂,尽在辽廷矣”,宣示对中原王朝的合法性宣称。辽圣宗时期的马得臣也“引盛唐之治以谏其君”^[11],辽朝曾尝试入主中原而不得,随后尽管通过澶渊之盟的缔结与宋互称南北朝,然对于中原王朝而言是不同的异质帝国。但北方契丹辽朝及随后的女真金朝(金世宗被称为“小尧舜”)对中原继承话语的或明或隐的争夺,仍是令宋朝统治者所忌惮的,对于宋朝统治集团来说转向以汉唐叙事为

价值坐标, 重构政治合法性是必然选择。

如果抛开以王朝断代为基点的史观, 我们不难发现, 宋代实际上是中晚唐以来多种政治与社会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唐与宋之间的历史连续性, 绝不应被后世的分期逻辑所忽略。同时, 宋代所塑造的文化遗产, 对元、明、清乃至当代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 在研究唐代的文化与历史时, 宋人的诠释往往是不可回避的一部分。在北宋初期的政治进程中, 历史上的兄弟阋墙、后宫干政、宦官专权以及军阀割据等教训, 成为宋人反思政治弊端的反面教材; 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则被视为理政典范, 供后人借鉴。正是在这种对前朝历史的深刻总结过程中, 宋人逐步构建起一套“汉唐叙事”模式, 尤以对唐代的继承与再造为最, 使得唐朝在宋代政治与文化的语境中不断被重写和重构。

进入宋代, 尤其是在北宋初期, 面对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宋人开始有意识地构建“汉唐故事”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赵宋统治集团通过将汉唐塑造为上古“三代”以降的治世巅峰, 建构起以华夏礼治为核心的话语体系, 对内以“汉唐故事”革五代之弊强化士民对赵宋政权正统性的认同, 对外则通过“华夷之辨”叙事确立宋在东亚地缘政治中的文明中心地位。宋代统治者试图在历史中寻求凝聚人心的资源, 强化对赵宋政权的认同。这种历史叙述不仅体现在政治宣传中, 也深刻影响了宋代的政治文化、史事编纂与文学叙事。

天禧五年(1021), 众臣因真宗久病“上表引汉宣帝、唐高宗故事, 请五日一御便殿”^[12], 而后吕义简在给宋仁宗上尊号时写到“事沿盛唐, 以冠元首”是按“盛唐”法度行事。宋人在历史典故中寻找行事依据, 而根据普遍社会观念, 仅有盛世方可仿效, 因此汉唐无疑是最为理想的时代。范祖禹因写就《唐鉴》被称为唐鉴公, 他常援引唐例处事: “夫唐太宗之政如彼, 汉高祖之法如此, 有天下者当以盛唐为法乎? 当以季汉为法乎?” 此汉是指后汉了, 这里以后汉与“盛唐”(唐太宗)为对比, 突出唐朝政事之有效, 范祖禹此问, 实际上是将唐与五代相对立, 宋人不再是人亡政息的“第六代”因而要效仿“盛唐”(唐太宗)。这一点在南宋亦有体现, 宋孝宗时国子祭酒何澹奏称: “祖宗盛德大业, 见于二百年之间, 制度典章, 上追三代, 下陋汉唐”, 以“追三代”为话语外壳包裹着“超汉唐”的政治雄心^[13]。熙宁元年, 宋神宗诏王安石入对“帝曰: 唐太宗何如? 曰: 陛下当法尧舜, 何以太宗为哉”, 这里暴露出王安石的雄心, 事沿唐旧是因循守旧之举, 上古圣君典

范才是为政之道^[14]。

宋人通过弹性化运用汉唐资源, 既奉为圭臬, 又为比较基准, 最终完成宋人政治话语实践。叙述历史本质上是国家意识形态构建与政治动员的核心机制, 王朝国家通过“叙述”这一方式选择性激活集体记忆谱系, 构建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根基。赵宋王朝政治展开于五代的框架之上, 正如闫建飞所说“对当时的统治集团来说, ‘走出五代’、避免成为第六代短命王朝, 是最迫切的历史任务”^[15]。这种任务实现于对梁唐晋汉周五代的彻底重构。五代被压缩为“黑暗时代”的他者时代, 赵宋成功使自我身份从“第六代”跃迁到“汉唐中国”的继承者。

宋代在继承前朝历史阐发王朝整正统性的同时, 发展出更具反思性的策略, 通过引用“故事”作为国家行政的现实范例, 绝非简单的先例崇拜, 而是宋人超越传统“以史为鉴”的实用主义。宋代修史蔚然成风, 宋人通过谱系接续, 从《旧唐书》到《新唐书》, 从《旧五代史》到《新五代史》, 再到《资治通鉴》编纂, 赵宋士大夫集团通过整理历史故事, 对汉唐典制进行系统性整理, 完成了对五代暴力政治的反思与驱离实现代际合法性传递, 以历史解释重塑士大夫阶层的“共同体”意识。如官修史书工程嘉祐七史纂修所示, 修史也是宋代官方的一项长期工程:

嘉祐中, 以宋、齐、梁、陈、魏、北齐、周书舛缪亡缺, 始命馆职雠校。曾巩等以秘阁所藏多误, 不足凭以是正, 请诏天下藏书之家悉上异本, 久之始集。治平中, 巩校定《南齐》、《梁》、《陈》三书上之, 刘恕等上《后魏书》, 王安国上《周书》。政和中, 始皆毕。颁之学官, 民间传者尚少, 未几遭靖康丙午之乱, 中原沦陷, 此书几亡^[16]。

“盛唐”究竟具体所指于唐朝哪一个时期, 在南宋以前恐怕不能直接定论, 古文运动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欧阳修提出“唐有天下三百年, 文章无虑三变”, 将唐代文章演进过程分为“高祖-太宗”“玄宗”“大历-贞元”三个阶段, 至韩愈“此其极也”^[17]。欧阳修“唐文三变”之说至南宋演变为“诗学三变”, “唐文三变, 诗亦然, 故有盛唐、中唐、晚唐之体”^[18]。宋人在“唐鉴”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认同, 至南宋已然将“盛唐”纳入文学分期之范式中, 这大概也受“开元十五年后, 声律风骨始备矣”^[18]之类唐人评语的影响。严羽对“盛唐体”做出了明确定义, “盛唐体, 景云以后, 开元、天宝诸公诗”^[19]。严羽的“以盛唐为法”是北宋以来“唐鉴之风”的具象

化体现。然南宋人将开元天宝年间锚定为一个万金油的“盛唐”概念,反映的是宋人基于自身政治文化语境所作的价值投射,“盛唐”作为诗学分期的规范并非唐人诗学自觉之产物。正如南宋陈著所发问:“及阅其序《续古集》,则欲以唐体为宗。然则唐故多体,将宗谁耶?”^[13]唐人文学观以“体”为核心范式,无论是初唐“沈宋体”确立近体律诗体制,还是白居易“体变新”所描述的文体代变,皆指向“体新”,而非宋人所标举的一个时代之“盛唐气象”。“盛唐体”在诗史演进层面,隐然成为唐宋诗学分野的博弈战场,宋人通过尊盛唐贬晚唐来达到界唐分宋的目的,这种对立的诗学修辞暴露出南宋文人的深层焦虑,当宋度宗以皇帝身份宣称“文窥先汉,诗到盛唐”时,所谓客观的历史分期已实然成为文化规训之工具^[20]。

综上所述,“盛唐”概念是一场历史话语的层累建构史。唐人虽以“尧舜”“汉武”圣君符号和开元天宝史事塑造盛世观念,但中晚唐以来的政治实践始终濒于挫折,盛世与中兴叙事逐渐变为唐人所集体追忆的想象空间。事实上,八年的战乱结束以后,唐朝仍存在了近一个半世纪,在此期间“安史之乱”逐渐被刻画为唐人的集体记忆。在由唐至宋的过程中,文人精英对于开天时期的感性认知进入文学创作,宋代对于唐代历史与文学的回顾,体现出以“唐鉴”为范式的制度与文化整合逻辑。宋人通过史事编纂、“汉唐故事”援引及“盛唐诗学”的范式化,将“盛唐”建构为政治典范与审美范式合一的文化共同认知,宋人由此在历史话语中确立赵宋政权的承汉继唐的正统性以及辽金政权的差异性。

参考文献

- [1] [北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 [2] 田成浩. 先代帝王祭祀研究[D]. 武汉大学,2020.
- [3] [清]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M]. 北京:中华书局,2010.

- [4] [清]董诰. 全唐文[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5] [清]彭定求等编. 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 [6] 陈尚君辑校. 全唐诗补编[M]. 北京:中华书局,1992.
- [7] 王炳文. 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 [8] 仇鹿鸣. 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 [9] 李碧妍. 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10] 邓小南.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M]. 上海:三联书店,2014.
- [11] [元]脱脱等. 辽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2] [宋]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3] 曾枣庄,刘琳编. 全宋文[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 [14] [元]脱脱等.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5] 闫建飞. 走出五代——十世纪藩镇研究[M]. 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
- [16] 陈元锋. “修故事”:宋人的制度考古意识与文学活动[J]. 文学遗产,2018,(01):81-94.
- [17] [北宋]欧阳修等.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8] [唐]殷璠. 河岳英灵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14.
- [19] [清]何文焕辑. 历代诗话[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20] [南宋]陈世崇. 随隐漫录[M]. 北京:中华书局,2010.

版权声明: ©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